

列宁的社会主义道路新探

程传阁 李惠群

本文从动态发展上历史地辩证地探究了从十月革命胜利到列宁逝世七年间,列宁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轨迹。重点探讨和解决了两个问题:一、列宁虽然在1918年春的“和平喘息时机”已经准备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并提出了经济建设的纲领,但就其指导思想和方法来说,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一样,都是试图在俄国用“直接过渡”的方法走向社会主义。二、第一次从动态发展上考察分析了新经济政策,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发展的“三阶段论”;同时,作者认为,新经济政策作为列宁探索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不仅指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措施,而且还包括政治、文化建设等。而这种关于社会主义的全面思考是列宁在其生命最后时刻完成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摆在列宁面前有两大难题,一是帝国主义的包围,首先是帝国主义的军事包围;二是在没有其他国家、特别是先进国家的合作和经济技术的援助下,单独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客观形势要求这两个问题必须同等重视和同时解决,因而决定了列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大了我们后人研究和把握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难度。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列宁的指导思想经过了一个从“直接过渡”到“间接过渡”的转变,这是国内外学者都普遍承认的。但是,对于“直接过渡”的内涵和外延以及“间接过渡”本身的理解却存在着不少分歧和争议。本文试图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广大同仁。

十月革命后,列宁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直接过渡”阶段从1918年初到1921年初,包括人们平常所说的1918年春苏维埃的“和平喘息时机”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但是,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的传统观点都把1918年的“喘息时机”与“战时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认为十月革命后即1918年春季,布尔什维克党就立即准备按新经济政策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斯大林甚至认为在这一时期,列宁“已经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原则。”^①)。但是,由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爆发被迫中断而改行“战时共产主义”。因此,“战时共产主义”只是一种战时经济,是在似乎偶然的条件的压力下被迫采取的措施。国内战争一结束,苏维埃就立即取消“战时共产主义”而转向新经济政策。我们认为,这是不符合列宁思想发展的实际的。通过研究,

我们发现从1918年到1921年春的整个历史时期，列宁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指导思想是始终一致的，即试图不通过任何中间环节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用列宁自己的话说就是“一旦有了政权，就可能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②因此，我们把这一时期统一概括为“直接过渡阶段”来进行考察和研究。

“战时共产主义”充分体现了列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这是国内外学者基本一致的看法，这里不再赘述。这里重点讨论的是为什么要把1918年春的“喘息时机”和其后的“战时共产主义”看作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有什么理由认为列宁在“和平喘息时机”的指导思想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一样，都是“直接过渡”的思想呢？我们认为，主张把“和平喘息时机”和“战时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不同阶段，进而认为在“喘息时机”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就准备按新经济政策原则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混淆了两个问题，即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准备进行经济建设与用什么方法进行经济建设混为一谈。

诚然，我们也认为，1918年春“布勒斯特和约”签订后，苏维埃俄国赢得了暂时的“喘息时机”，而列宁抓住时机，毫不犹豫地将工作的重点转向了经济建设。这集中表现在1918年3—4月列宁起草的经济建设纲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在此文中，列宁提出了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内容的纲领性任务：（1）组织对生产和分配的社会监督（“计算与监督”）；（2）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

关于第一项任务，列宁强调说，剥夺资本家的财产，把它收归国有，并不等于完成了生产的社会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必须组织新的生产秩序。因此，一方面，要在新的条件下，用经济组织的方法继续进行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基础得到巩固以前，需要放慢进一步剥夺的速度。但是速度的放慢，过渡的渐进性，在列宁看来，并不是迫于形势而作出的策略性让步，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需要：“社会主义需要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超过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③因此，需要采取诸如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雇用资产阶级专家等措施。

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并不把它当作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认为它是“任何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而且，他实际上把它看成是建立新的社会形态的实质。因此，除了发展大工业基础和群众的文化水平以外，他十分强调合理的生产组织与加强劳动纪律。除此，列宁又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必须实际采用和试行计件工资制，采用泰罗制中许多合乎科学的进步的方法，以及根据生产的产品总额，或铁路运输业的经营结果来决定工资等等。”^④

但是，透过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列宁这时是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实现经济任务的组织方面，首先是在寻找把理论纲领付诸实践的最成功最有效的组织方法。这种组织方法在当时主要是指计划的、统一的（“计算和监督”）、集中的、强制的方法。在当时，列宁虽然也肯定了俄国是一个小农国家，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小商品生产者，但是并没有认识到，在这样一个国度里要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必须适应这种占优势的小农经济、小商品生产者的发展，而充分利用“市场”、“商业”，把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作为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经济联系。正象列宁自己所说的，“我们说，现在我们的任务已经不是剥夺剥夺者，而是统计、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纪律。这是我们在1918年3、4月间说的，但是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有何种关系的问题。”^⑤相反地，列宁那时却认为，既然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物质基础，因此，只要首先把大工业抓起来，就可以由国家用工业品与农民交换农产品。由于大工业受到破坏，恢复遇到困难，所以提出要利用国家资本

主义，即由国家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来共同恢复发展大工业。与此同时，在农业中大力推行共耕制、劳动组合、农业公社，“帮助小农业走向社会化。”^⑤认为这样就可以为社会主义奠定经济基础了。正因为当时这样的指导思想，所以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着重讲的是如何恢复大工业的问题，特别强调的是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上建立最严格的全民计算、统计和监督；同时强调在农业中也要“组织各公社间的竞赛”，尽力推广模范公社的事例，发挥模范公社的“榜样的力量”等等。这样的指导思想，也就是想直接通过国家的工业化（包括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和农业社会化来建设成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恰恰是忽视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小农经济的力量、作用和特点，脱离了一个小农国家的实际，试图直接过渡的指导思想。

列宁在1921年10月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最能说明问题，他指出：从1917年到1918年初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声明可以看出，那时认为革命的发展可能是通过比较短的道路，也可能是通过漫长而艰苦的道路。“但是，在估计可能的发展时，我们多半（甚至我记得没有何种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推断出发的，可能这种推断并不总是公开表达的，但始终是默然意会的，我特意重新阅读了例如1918年3、4月间写的关于我国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任务的文章（指《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引者注），我相信我们真有过这样的推断。”^⑥在另一个地方列宁又说：“不论是1918年4月或1920年4月我们所想象的从战争到和平建设的过渡，都是在同一政治轨道上的简单过渡（指依靠政权力量、国家法令和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的办法去实现过渡——引者注），过渡是复杂的；另一种与农民的关系，另一种速度，另一种情况。”^⑦可见，那种认为在1918年春列宁就准备按新经济政策的原则来建设社会主义，从而把1918年春与“战时共产主义”划分为不同阶段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二

一方面由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1921年初苏维埃俄国所出现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迫使列宁必须立即迅速地、刻不容缓地改变“战时共产主义”的各项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因为列宁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从苏维埃当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危机等纷繁复杂的现象中，看到了它们背后所存在的更为深刻的本质的东西，即俄国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农民国家，从这种实际出发，适应小生产者的需要，就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商业等一系列中间环节，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从而发展社会主义大工业，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1921年3月列宁提出并实施了新经济政策。但是，学术界大多从静态上来研究新经济政策学说和政策主张，而很少从动态、发展上进行研究。我们认为，作为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和方法，新经济政策理论并不是一下子形成并达到成熟和完善的。我们知道，新经济政策是在实践中提出来的，在它提出之后，又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自1921年春提出新经济政策之后，列宁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21年3月到10月，即提出新经济政策的最初六、七个月的时间。当时提出的任务是退到国家资本主义，把商品交换这个形式确定下来。第二个阶段，从1921年10月底开始的，提出的任务是必须再后退一些，不仅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而且要退到由国家来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第三个阶段，主要是指列宁晚年在病榻上对于“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总结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方位思考（集中表现在列宁口授的“五篇政治遗嘱”中）。

关于第一阶段，即退到国家资本主义和把商品交换这一形式确定下来。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物质基础，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基本的任务就是要恢复和发

展大工业。提出和改行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就在于为了恢复和发展大工业，首先必须迅速恢复发展农业，在苏维埃俄国当时条件下，最主要的就是要恢复发展小农经济。列宁分析道：“我们必须懂得，在大生产彻底胜利和恢复以前，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些为商品流转而生产的小农、小业主和小生产者。”“只要小农还是小农，就必须保证小农经济有一定的周转体系，否则它便不能生存。我认为这个问题对苏维埃政权来说，是当前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⑧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准允地方经济流转中的自由贸易，帮助恢复和发展私人的小工业，以及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国营工厂、企业实行租让和租借等等，所有这些措施、新的政策，都是为了使农业能够尽快地首先得到恢复和发展，使小农经济能够迅速地振兴起来，从而带动整个经济，为大工业的恢复发展创造条件。这就是列宁所讲的，“既然恢复大工业是这样的困难，那我们即使在小农经济的阶段上和暂时在小工业的基础上，也应当、而且能够提高生产力。”^⑨

在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列宁也多次反复明确地指出过：由于改行粮食税，准许地方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加之私人小工业、小商业的发展等等，这样的结果就会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使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资本主义复活起来。列宁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它是政治经济学上最初步的真理，是一个小农国家的经济结构、经济条件所决定的。但列宁又认为这是不可怕的。相反，指出要把资本主义的这一发展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⑩。为了便于把在自由贸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列宁给自由贸易和商品流转规定了两个限制：一是只准许在地方经济周转、地方市场的范围之内；二是国家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建立系统的商品交换，由国家直接用工业品去交换农民手中的剩余粮食和其它农产品，这实际上是一种物物交换(或产品交换)。

虽然这些政策的初步实行对国民经济的恢复起到了显著成效，“经济生活活跃、劳动生产率提高。”^⑪但是，在刚刚开始的前进中也同时遇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1921年10月29日，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所指出的：“现在我们从实践中以及从我国一切报刊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商品交换失败了”。“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国家受到严重的破坏，……我们要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最困难的工作……，建立工业和农业间的正常商品交换(更确切些说，是产品交换)。敌人比我们强大得多；无政府状态的、跑单帮的、个人的商品交换，到处都在破坏我们的工作。”^⑫这就是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阶段，即初步实行的过程中，出现的客观情况。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也丝毫没有动摇，他不但没有提出因此而要刹车，禁止自由贸易、私人商业，再回到战时共产主义去；相反地他坚持科学态度，从客观现实情况出发，坚决地提出再向后退，退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在经济工作上向国家提出了更为复杂而困难的任务。从而将新经济政策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阶段是列宁在总结第一阶段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新认识。它不再是试图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建立起直接为国家控制的商品交换，去排挤和限制农民的自由贸易、私人商业，而是允许其发展，并随着它的发展使之受到国家的调节。列宁指出：“1921年春天，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年初，还要继续退却，如果我们对自己、对工人阶级、对群众隐瞒这一点，那么就等于我们根本没有觉悟，等于没有勇气正视现状。”“1921年春天我们不得不从社会主义建设退却到国家资本主义，在这之后我们看到，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我们所处的经济环境，是由国际国内的全部经济政治条件造成的，我们的经济环境是货币流通；而不是商品交换。”^⑬因此，列宁很快就取消了新经济政策之初对商品交换所

做的两种限制：“在所有商品交换业务中，第一，我们不应当受地方范围的限制。第二，在进行实物商品交换的同时，在有利的地方，我们要坚决地过渡到货币形式的交换，即W—G—W。”^⑭列宁认为，虽然“这条道路比我们预料的要长，但是，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恢复经济生活。恢复正常的经济关系，恢复小农经济，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恢复和发展大工业。不这样我们就不能摆脱危机。别的出路是没有的。”^⑮

从新经济政策的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列宁进一步摆脱和纠正了“直接过渡”的思想。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的“结束语”中，对自己在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初期，即第一阶段的指导思想作了严格的检查和认识。列宁讲道，今年春天实行了新经济政策，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活动手段、方式和方法，“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停止退却，而开始准备进攻了呢？不，这还是不够的。”因为提出不怕回到国家资本主义，当时的想法就是要把商品交换这一形式确定下来，即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地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去换取农产品，想通过这种商品交换来恢复作为社会主义唯一基础的大工业。这实际上仍然是想用“冲击”的办法，即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占领和代替资本主义的商业阵地。列宁指出：“如果用冲击方式就能占领资本主义的商业阵地，……那就痛快得多了”，“我们就不会来搞独立会计和作生意艺术这套讨厌的玩意了。”但是实际证明这样想是犯了错误，“实际情况给予我们的不是商品交换而是货币流通，现金交易。”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必须再退却，“一直退到商业问题成为党的实际问题，成为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为止。”“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使大工业迅速恢复并且尽快地同农业结合起来，……在大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里，这一切做起来要快得多，可是在我国，就要通过一条曲折漫长的道路。”春天所通过的决议，其根据是“我们通过商品交换，可以更直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这方面还需要通过商业这条更加迂回的道路。”^⑯正是由于取得了这些认识，列宁才完全纠正和摆脱了直接过渡的指导思想。

但是，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新经济政策不仅仅限于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措施，更不能仅仅归结为商品经济理论本身，它是一个不仅包括经济建设，而且包括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在内的总体学说和理论。这一对社会主义的总体思考和把握，是列宁晚年完成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改行新经济政策之后（“间接过渡”时期）列宁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列宁这一阶段的思想集中表现在1923年1—3月他在病榻上口授的五篇“政治遗嘱”中：《日记摘录》、《论合作制》、《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关于如何理解列宁最后的口授论文的问题，早在列宁逝世后的二、三十年代，苏联党内就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具有典型意义的两个代表人物是斯大林和布哈林。当时在党内处于主导地位的斯大林，认为列宁“在这些最后的论文中，他总结了过去的工作，并拟定了我国用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方法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列宁提出了他主张吸收农民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事业的合作社计划。”斯大林并且把列宁遗嘱中的合作制计划，解释为就是“过渡到集体农庄的道路。”^⑰按照这种解释，列宁的合作制计划被说成是苏联后来实行“全盘集体化”、否定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首领的布哈林则与斯大林正好相反，他把列宁遗嘱作为反对强制实行“全盘集体化”的理论根据。他认为列宁遗嘱中的重要之点是“可以不再对农民使用暴力而达到社会主义。”^⑱可见，两者争论的中心实际上就是列宁的最后口授论文与新经济政策的关系问题。

我们认为，列宁的最后口授论文，是列宁在总结新经济政策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对于新经济政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也就是说，在列宁的“政治遗嘱”中，除保持了新经济

政策的实质性的东西之外，还为这条道路增添了极为重要的新内容，从而使新经济政策成为比较完整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这些新内容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1)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规律与落后国家的特殊规律的辩证关系上，进一步阐述和肯定了新经济政策道路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论我国革命》中，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针对苏汉诺夫等所一再重复的“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从而否定十月革命的观点，深刻地分析道：“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⑩列宁又说：“记得拿破仑这样写过：‘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我们也是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⑪这就是列宁在这篇最后口授论文中，对他找到的新经济政策道路所作的总结和评价。

(2) 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合作制计划，经典性地作出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⑫的科学结论。并且从世界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上，特别是西欧先进国家的革命推迟下去的情况下，阐述了在俄国怎样保住工人政权在小农和最小农中的威信和对他们的领导，并用厉行节约的办法逐步实现工业化、电气化。这些思想列宁在《论合作制》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作了集中的阐述。

(3) 不仅从经济建设，而且从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全面思考，从而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济政策道路。合作社怎样才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列宁在《论合作制》里向布尔什维克党和全体苏维埃人民提出了两个划时代的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受下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这种机关，我们在五年来的斗争中还来不及也不可能来得及认真加以改造。我们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⑬列宁在《日记摘录》、《论合作制》、《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著作中详细地论述了这方面的思想；提出和阐明了文化革命即文化建设的任务和意义；从政治体制的改革上，从党和国家机关的民主化、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和注意培养、挑选人才上，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建设的光辉思想和具体措施，等等。至此，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最后形成。

注释：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29页。

②⑤⑥⑫⑬⑮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66、64—65、9、45、73、74、77、81页。

③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501、511页。

⑦⑧⑨⑩⑪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4、176、177、133、134、134、135、71—72页。

⑭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第104—105页。转引自《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

⑯ 《列宁全集》第33卷，第62、64—66、69—74、79—82页。

⑰ 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1949年版，第312—322页。

⑱ 参见《布哈林文选》（中），东方出版社，第347—351页。

⑲⑳㉑㉒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691、692、684、687、687页。

（本文责任编辑 涂赞琥）